

敦煌讲座书系

# 敦煌历史地理



郑炳林 李 军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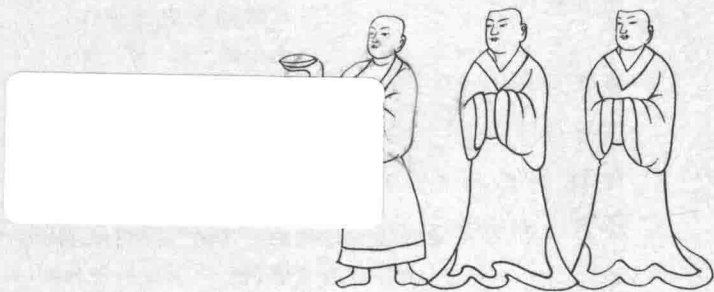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郑炳林 李 军 著

# 敦煌历史地理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历史地理 / 郑炳林, 李军著. -- 兰州 : 甘肃  
教育出版社, 2010. 12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378-1

I. ①敦… II. ①郑… ②李… III. ①历史地理—敦  
煌市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5095号

出版人: 吉西平  
策 划: 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 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 冯 莉 秦才郎加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敦煌历史地理

郑炳林 李 军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8.5 插页 4 字数 382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2378-1 定价: 55.00元

#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做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前 言

敦煌，是一个令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名字。

西汉时期，汉武帝通过使用武力，从匈奴手中夺得河西走廊。为了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并更好地经略西域，武帝在河西之地“列四郡，据两关”（《汉书·西域传》）。其中，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成为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而设置于敦煌西北及西南的玉门关和阳关俨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两处关隘。凭借着特殊的区位优势，敦煌一方面成为中央王朝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同时其也是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市场。随着丝路贸易的兴盛，敦煌发展成为“华戎所交”的著名都会（《续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志》）。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时期，敦煌都始终没有脱离过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视线；追逐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西域使者、胡商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敦煌的青睐。隋唐大一统帝国的赫赫声威，再加上当时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吸引着更多的使者及商人途经敦煌，最终抵达帝国的核心——长安。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敦煌一度由贸易重镇转型为部署在河西地区的唐朝军队抵御吐蕃的军事重心。在经历了60余年的吐蕃统治期后，敦煌人张议潮在晚唐大中年间弃蕃归唐，唐政府也曾在此设置归义军以统辖河陇诸地。但随着唐帝国的衰亡以及西北诸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敦煌最终沦为隔绝于

中原的化外之地。虽然在元朝和清朝时期，敦煌又被重新纳入中央的统辖范围，不过作为僻远边镇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敦煌再也没能恢复其在汉唐时期的风采。

敦煌并没有沉寂太长的时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也就是在古老的传统中国即将发生巨变的前夕，王圆箓用一把锄头打开了莫高窟藏经洞的大门。这使得一度被历史所遗忘的敦煌又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之中，而藏经洞中5万余件的古文献也催生了一门被命名为敦煌学的新学问。

敦煌学诞生之初，学者在敦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地理文书的录文及校勘方面。早在1909年，罗振玉就对《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P.2695）、《西州图经》（P.2009）等文书进行了校录。<sup>①</sup>此后，刘师培、Lionel Giles（翟理斯）、伯希和、羽田亨、向达、王重民、池田温等学者，除了关注上述已经刊布的文书外，还陆续对《贞元十道录》（P.2522）、《沙州伊州地志》（S.367）、《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寿昌县地境》等文书进行了校录及研究。<sup>②</sup>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对敦煌地理文书的整理更加全面化和系统化，出版了《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敦煌

① 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排印本。

② 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7卷1—8期，1911年；Lionel Giles, *Tun Huang Lu: 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uly 1914, pp.703-728；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亚洲报》1916年12月刊（此据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25—29页）；羽田亨《唐光启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について》，《小川博士還曆論叢》，弘文馆，1929年，第131—152页；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第1—11页；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06—123页；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還曆纪念東洋史論叢》，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31—101页。

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等一批整理及辑校敦煌地理文书的专著。<sup>①</sup>随着敦煌地理文书辑录工作的大致完成，学者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文书所反映的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上，产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sup>②</sup>

经过百余年的积淀，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呈现出了涵盖领域众多、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的特点。一部书的规模实难涵盖敦煌历史地理各领域研究的全貌，故笔者并未追求面面俱到，而在汲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区演变及人口变化、对外道路交通、经济地理、河流及水利工程、军事地理等5个方面进行探讨。

长期以来，敦煌政区建置沿革及人口变化都是学者所关注的重点。齐陈骏、宁可、郝春文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关注了从西汉至明清时期敦煌政区建置沿革及人口变化情况。<sup>③</sup>榎一雄等人合力完成的《講座敦煌》第2卷《敦煌の歴史》则主要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国内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总结，反映了当时日本学界对于敦煌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sup>④</sup>此外，刘光华、吴初骧、荣新江等学者分别对自上古至清代的敦

①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仲萃《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

② 关于学术界对于敦煌地理文书的整理及研究情况，可参屈直敏《近百年来敦煌地志文书研究回顾》，《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65—80页；李并成《百年来敦煌地理文献及历史地理的研究》，《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41—43页。

③ 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氏著《河西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7—97页；张仲《敦煌简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

④ 榎一雄主编《講座敦煌》第2卷《敦煌の歴史》，大东出版社，1980年。



煌史地进行了深入研究。<sup>①</sup>从资料来源来看,以往的研究大多主要依靠传世史书。由于传世史书对地处西北一隅的敦煌记载比较匮乏,所以本书在探讨唐宋之际敦煌的建置及人口变化时,充分利用了对敦煌史地记载较为详细的敦煌文献,有利于全面地复原敦煌的历史面貌。

对于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与地位,隋人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是其咽喉之地”的定位最为贴切。由于汉唐之际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故敦煌在汉唐之际中西交通史中的地位尤为特殊。严耕望、陈国灿、李正宇、李并成等先生利用史书及敦煌文献,从总体上探讨了唐代敦煌通往瓜州、伊州以及西域各地的交通路线。<sup>②</sup>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以敦煌对外交通中的某条具体路线进行个案研究,通过探讨这些路线的走向及驿站设置等问题,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敦煌交通的认识。<sup>③</sup>

① 研究成果主要有: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吉川弘文馆,1964年。(本书据陈俊谋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第3期,1983年,第33—43页;吴初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西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第24—32页;汤长平、周倩《西魏北周时期的河西》,《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第121—129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楚古耶夫斯基《八—十世纪的敦煌》,桑林摘译《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炳应《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78—90页;贾俊霞《明清时期的敦煌》,《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第56—61页。

② 严耕望《唐代凉州西通安西道驿程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3分,1971年(收入氏著《唐代交通图考》篇十二《长安西通安西驿路下——凉州西通安西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1—495页);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段文杰等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216—236页;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李并成《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丝绸之路》2009年第6期,第36—38页。

③ 相关研究主要有:郑炳林《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的大碛路》,《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21—129页;王去非《关于大海道》,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5—493页;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路考》,《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201—215页;李正宇《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82—91页;程喜霖《从唐代过所文书所见“西域”的中道》,《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58—67页;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而本书在明晰敦煌四出道路走向的基础上，更为关注这些道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使用情况。通过钩稽史书和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努力将具体的历史事件与道路交通紧密地结合起来。

由于史书记载的缺乏，再加上敦煌文献特殊的时代性特征，本书对于敦煌经济地理、河流及水利工程、军事地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唐宋之际。对于这个时期敦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马德、乜小红、刘进宝等学者从敦煌工匠、畜牧业、归义军赋役制度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重点关照。<sup>①</sup>而本书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3个方面予以全面和充分的探讨。对于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堰坝及渠道的修建状况，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及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等文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书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及钩稽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对敦煌的4个绿洲灌溉区及主要灌溉渠道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以往学者已经从军防设施的角度，对汉唐之际敦煌的军事地理进行了详尽的研究。<sup>②</sup>故本书的重点并未放在汉代长城遗存调查、关隘位置的明确以及军事管辖体系研究等方面，而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线索，关注各个历史时段中敦煌的军事态势的变化。

本书在尽可能地吸收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注重敦煌与中国历史的共通性，另一方面也格外重视敦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不过，由

① 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乜小红《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业研究》，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② 相关论著主要有：黄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镇与八镇考》，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9—281页；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第555—580页；程喜霖《汉唐敦煌军防》，段文杰等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第27—49页；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冯培红《归义军镇制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245—294页。

于受条件的限制，本书对日本敦煌学界及西方汉学界的成果吸收远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这是我们要检讨的，也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加以弥补和改进。

#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敦煌政区建置沿革与人口 .....	1
第一节 西汉之前 .....	3
第二节 两汉时期 .....	6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	16
第四节 隋朝及唐前期 .....	31
第五节 吐蕃占领时期 .....	37
第六节 归义军时期 .....	42
第七节 西夏及元明清时期 .....	67
第二章 敦煌的道路与交通 .....	77
第一节 瓜沙道 .....	79
第二节 西域南道 .....	88
第三节 大海道 .....	116
第四节 大碛路 .....	130
第五节 稍竿道 .....	137

第六节 莫贺延碛道 .....	159
第七节 南山道 .....	174
第三章 敦煌的经济地理 .....	177
第一节 敦煌的农业 .....	179
第二节 敦煌的手工业 .....	221
第三节 敦煌的商业贸易 .....	255
第四章 敦煌境内的河流及水利工程 .....	277
第一节 敦煌境内主要的河流 .....	279
第二节 敦煌地区的水利工程 .....	297
第五章 敦煌的军事地理 .....	343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345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	359
第三节 隋朝及唐前期 .....	367
第四节 吐蕃统治时期 .....	377
第五节 张氏归义军时期 .....	383
第六节 曹氏归义军时期 .....	404
第七节 西夏及元明清时期 .....	410
参考文献 .....	417
后记 .....	443



# 第一章 敦煌政区建置沿革与人口

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在敦煌繁衍生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成为乌孙、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战场。随着西汉王朝对河西及西域广大地区的锐意经营，敦煌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此后，作为汉唐时期中央王朝统治区西端的敦煌，逐渐成为中央经略西域的战略基地。通常情况下，敦煌在全国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高下与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为了维持在敦煌的统治，中央王朝将实施于内地的各项制度，尤其是政区建置制度在敦煌推行。从这个层面上说，敦煌地区的政区沿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域制度实施情况的缩影。此外，虽然敦煌地处西北一隅，但其内部的人口变化却始终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伴随着敦煌、河西及全国政治局势的变动而随时发生变化。因此，敦煌的人口发展变化情况与敦煌、河西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 第一节 西汉之前

敦煌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截至目前，在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化遗存为火烧沟类型文化。1976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在疏勒河流域的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发掘了一批时代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的墓葬。从这些墓葬里出土的遗物除了有石器、陶器、铜器和金银器外，还有羊、猪、牛、马等大型动物的骨骼。其中，尤其以羊骨和成对的羊角为多。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制作水平看，火烧沟人的社会生活以牧羊业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当时，他们已经有了分工较细的手工业，已开始使用石锄、石磨盘、铜铲、陶器等器物。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玛瑙、海贝和蚌饰。这些物品均非当地所出产，证明当地和外界已存在比较密切的商品交换关系。学者在火烧沟遗址先后共清理了312座墓葬。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在数量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异，有的墓葬中的随葬品仅有少数的陶器，而有的不仅随葬的陶器数量大，同时还伴随着铜器以及金、银、玉器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等物品。有的墓葬里不仅用大量的牲畜随葬，甚至还出现了人殉。由此可



见，火烧沟人已经出现贫富分化和非常明显的等级差别。<sup>①</sup>但是，总体而言，学术界对战国以前敦煌先民的了解还很不充分，有待利用以后的考古发现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作为“四凶族”之一的“三苗”曾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长期作战。<sup>②</sup>舜在击败三苗之后，即将其迁于“三危”之地。西晋时期，杜预在注释《左传》的相关记载时，推测三苗的流放地“三危”当位于敦煌境内。到了唐朝，李吉甫在其名著《元和郡县图志》中更是将“三危”比定为敦煌地区的“三危山。”<sup>③</sup>此后，三苗被流放到敦煌的说法在学术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近年来，对于“三危”之地望，除“敦煌三危山说”之外，学者还提出“甘青说”、“西裔说”、“云南说”、“康藏卫说”、“四川说”等多种假说。<sup>④</sup>

敦煌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同为游牧部落的乌孙人和月氏人生活在“敦煌、祁连间”。到了秦朝建立之时，月氏已发展成为西北乃至整个北方最为强大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的游牧区域东至河西走廊的敦煌，西达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sup>⑤</sup>即使是实力强盛的匈奴，也被迫将王子冒顿送到月氏充当质子。<sup>⑥</sup>而到了乌孙王难兜靡统治时期，月氏击败了乌孙。难兜靡战死，

① 对于火烧沟类型文化的具体情况，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2—143页。

② 三苗的活动区域大致在河南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湖南和江西的北部一带。对于三苗的分布情况，参见安应民《“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考》，《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90—93页。

③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沙州敦煌县”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6页。

④ 相关情况可参见陈爱峰、杨梅、于晓冬《〈尚书〉“三危”地望研究述评》，《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1—105页。

⑤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5页。

⑥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8页。